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代表在七大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七大代表在七大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大代表在七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ISBN 7-208-05763-X

I. 七... II. 中... III. 中共七大(1945)—史料

IV. 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7886 号

总 策 划 郭志坤

责任编辑 黄建章

特约编辑 张利雄

装帧设计 傅惟本

技术编辑 姜华生

七大代表在七大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16 印张 25.5 插页 4 字数 614,000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763-X/D·997

定价 95.00 元



《七大代表在七大》

编 委 会

编委会主任 李忠杰

主 编 刘益涛 张延忠 李 蓉

副 主 编 杨圣清 覃 艺

目 录

中直、军直代表团

李富春在七大	1
邓洁在七大	16
黄火青在七大	17
萧三在七大	19
刘澜波在七大	20
易秀湘在七大	21
徐以新在七大	23
陈刚在七大	26
胡乔木在七大	28

陕甘宁边区代表团

林伯渠在七大	32
贺龙在七大	34
马文瑞在七大	38
贾拓夫在七大	40
习仲勋在七大	42
欧阳钦在七大	44
雷经天在七大	45
李维汉在七大	46
吴生秀在七大	48
张秀山在七大	52
张邦英在七大	54
阎红彦在七大	56
甘渭汉在七大	58
陈奇涵在七大	59
张宗逊在七大	64
谭政在七大	66
关向应在七大	68
萧劲光在七大	70
王维舟在七大	71
彭绍辉在七大	73
黄新廷在七大	75

王尚荣在七大	76
萧向荣在七大	80
郭化若在七大	83
李强在七大	85

晋绥代表团

林枫在七大	86
周士第在七大	89
刘俊秀在七大	92
张达志在七大	98
袁任远在七大	99
晏福生在七大	101
冼恒汉在七大	103

晋察冀代表团

彭真在七大	105
聂荣臻在七大	107
蔡畅在七大	111
邓华在七大	113
陈云在七大	114
罗瑞卿在七大	118
陈伯钧在七大	120
吕正操在七大	122
孙志远在七大	123
韩伟在七大	124
孙毅在七大	128
谷云亭在七大	131
成仿吾在七大	133
卓雄在七大	134

晋冀鲁豫代表团

刘伯承在七大	136
王从吾在七大	141

七大代表在七大

蔡树藩在七大 144
毛泽东在七大 146
王稼祥在七大 156
张闻天(洛甫)在七大 172
杨献珍在七大 184
刘亚雄在七大 186
陈赓在七大 194
高扬文在七大 195
李聚奎在七大 197
安子文在七大 201
陈再道在七大 205
钟汉华在七大 207
朱德在七大 218
彭德怀在七大 222
陆定一在七大 225
张际春在七大 236

山东代表团

朱瑞在七大 237
江华在七大 245
解方在七大 247
张经武在七大 251
陈光在七大 253
李天佑在七大 255
徐运北在七大 259

华中代表团

陈毅在七大 260
张鼎丞在七大 264
陶铸在七大 276
伍云甫在七大 278
韩先楚在七大 280
潘汉年在七大 281
王明(陈绍禹)在七大 286
陈郁在七大 293
张启龙在七大 294
任弼时在七大 295

刘少奇在七大 306
喻屏在七大 314
谭友林在七大 331
王世英在七大 332
郭述申在七大 334
傅秋涛在七大 336
刘培善在七大 338
范式人在七大 341

大后方代表团

叶剑英在七大 345
古大存在七大 348
邓颖超在七大 350
杨尚奎在七大 354
帅孟奇在七大 356
周恩来在七大 358
徐特立在七大 361
董必武在七大 362
凯丰(何克全)在七大 363
钱瑛在七大 366
李金德在七大 369
方方在七大 371
何浚在七大 373
罗孟文在七大 375
博古(秦邦宪)在七大 377
吴玉章在七大 390
梁华在七大 391

未出席七大会议的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

李立三与七大 393
张云逸与七大 396
郑位三与七大 397
曾山与七大 398
滕代远与七大 401
李葆华与七大 403

后记 405

李富春

在七大



在延安的后半期,李富春还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协助任弼时工作。

任弼时也是湖南人,与李富春毕业于同一所中学。20世纪20年代末,他们在上海相识。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留守上海,李富春任江苏省委代理书记。他们常在一起开会和商讨工作,往来比较密切。后来,他们都去了中央苏区,又共同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弼时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春中共中央派他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战的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随后留在莫斯科接替王稼祥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春天任弼时从苏联回国。此后,他留在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协助党中央和毛主席筹备中共七大,并处理书记处的日常事务。由于任弼时的工作十分繁忙,中央派李富春来协助他。

最初,李富春是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身份协助任弼时开展工作的,着重做了两方面的事情:

一是筹备党的七大。早在1937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决定召开党的七大,并成立了七大筹备委员会。后来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国共关系的恶化,特别是皖南事变的发生,党的高级干部一时难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开。但是,任弼时和李富春负责的七大的筹备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七大的会址是李富春陪同任弼时一起勘察的。他们乘坐华侨募捐赠送给毛泽东的救护车先后到安塞真武洞、枣园后沟等地视察,因为这些地方离延安较远,交通不方便而没有采用。最后,他们选中杨家岭,并决定在这里建一个礼堂作为七大的会址。这个决定得到中共中

七大代表在七大

央的批准。此外，他们还审查七大代表资格和准备七大的各种文件和资料做了很多的工作。

.....

从1942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延安发动了一场长达3年的整风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作为中央秘书长的李富春，不仅协助任弼时做了大量日常工作，同时，自觉发挥了“中央的政治助手”的作用。

按照毛泽东的想法，延安整风是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通过学习、讨论和提高认识，解决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具体来说，就是要肃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集中表现在两个时期：一个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即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左”倾错误；另一个是抗日战争初期，即王明在武汉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时期的右倾错误。这些错误经过遵义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应该说已经得到纠正，但是，由于紧张战争形势，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来得及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错误的根源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总结，因此党内指导思想常常存在分歧。毛泽东希望通过整风学习的办法来统一全党的思想。

在正式发动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前，中共中央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又称为九月会议），组织高级领导干部总结历史经验。这是党为准备整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他说，遵义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做了斗争，但是“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因此，还要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围绕毛泽东的报告，会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写道：“在政治局的五次会议上共有二十八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不少同志列举了历史上的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认真尖锐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本着对中国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在会上进行了沉痛的检讨，不少同志是两次发言，有的同志甚至做了三次发言，诚恳检讨自己的错误。”刚刚担任中央秘书长的李富春列席了这次会议，并且积极拥护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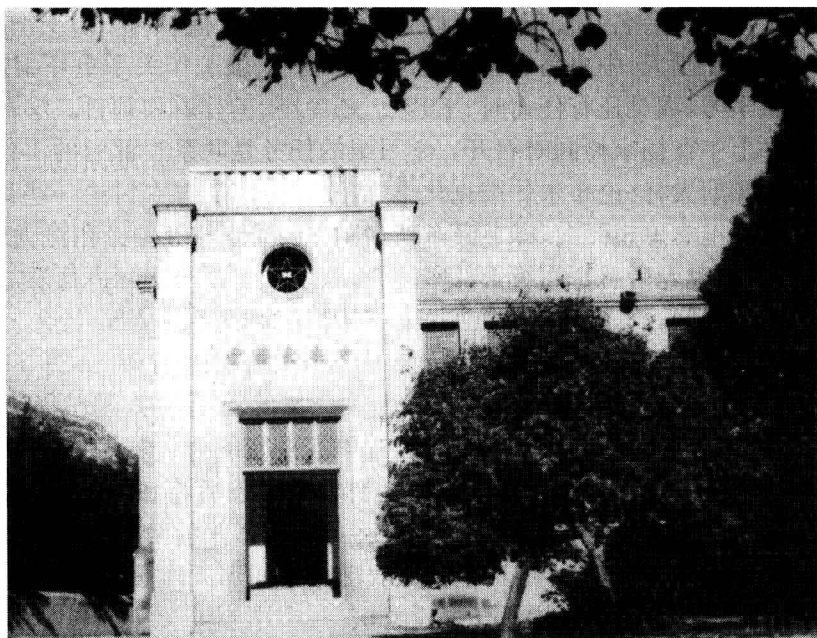
会上，只有王明的表现使与会者普遍感到不满，他两次发言丝毫不做自我批评，相反将错误诿过于人。为了帮助王明，会议期间，毛泽东偕同王稼祥、任弼时找他谈话。王明不仅拒不认错，反而攻击抗战以来中央的方针政策太“左”了，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它。他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同蒋介石设法妥协，并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为进一步明辨是非，毛泽东于10月8日召开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李富春列席了这次会议。王明在会上继续坚持错误主张，受到包括李富春在内的与会者的批评。因为王明在争论中提出对目前形势和政策的许多原则性问题，毛泽东提议暂时停止讨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错误问题，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说明，

但是,王明却突然称病不肯出席政治局会议,使会议未能召开。此后,他长期称病,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尽管如此,中央领导层在九月会议上还是基本上取得了共识,毛泽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为以后整风运动的全面展开确定了基调。

九月会议期间的9月15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研究了中央秘书处的的工作,确定中央秘书处为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机关。9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通知,以任弼时兼任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王首道为中央秘书处处长,组织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负责处理书记处日常工作。12月22日,经任弼时提议,中央交通局的工作也由李富春管理。

组织党的高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有关文件的学习,是搞好整风运动的重要措施之一。九月会议后,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和各地也先后成立了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和领导。李富春为组建延安及各地学习组做了大量工作。10月6日,受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委托,李富春和任弼时、康生、陈云共同确定了延安高级学习组的名单,及阅读各种文件的人员名单。当时,可以阅读中央电讯周报及政治情况周报等重要文件的人员除政治局委员外,增加了杨尚昆、彭真、李富春、林伯渠等十二人。10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还决定由李富春和任弼时、胡乔木共同审定在延安的百名左右有一定政治条件和文化水平的党的高级干部参加学习的名单,并由他们另行提出和审定参加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学习组的名单。1942年夏天,中央成立了9个高级学习组,李富春编在第三组,成员还有任弼时、王若飞、杨尚昆、王首道和师哲。此外,中央还委托李富春和胡乔木拟定学习组入学资格的条例,并将这个条例电发各地作为选择参加学习组的标准。

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一方面为了“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另一方面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1942年2月,中央通过了陈云关于总结十年内战时期白区工作及抗战五年来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的提议,并为此成立了专门机构——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王稼祥为主任,陈云为副主任。2月21日,经陈云提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增加了李富春、王若飞为委员,陶铸为委员会秘书。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做了许多工作,多次组织座谈会,将党的历史分时期、分阶段地进行总结。为了开好座谈会,事前,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组织熟悉历史情况的一些同志分头进行认真准备,比如,柯



为筹备召开七大,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陪同秘书长任弼时在延安勘察,最终选中在杨家岭建造一座中央大礼堂,作为七大会址。图为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外景。

七大代表在七大

庆施负责总结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历史；王若飞、康生、任弼时负责总结五卅运动；李富春、林伯渠负责总结大革命时期党在广州工作的历史；任弼时负责总结大革命时期党在武汉工作的历史；李维汉负责总结大革命失败后党召开八七会议至中共六大前的历史；王若飞负责总结中共六大等等。这些工作，为中央在整风运动中研究和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到1941年冬天在各地已经普遍开展起来。经过几个月的学习，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基本上取得了共识，这为在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准备了条件。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揭开了在全党范围开始整风运动的帷幕。

4月3日，中央作出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报告的决定，并成立五个系统的学习委员会，其中中央党校系统由毛泽东负责；中央直属机关系统由李富春和康生负责；学校（军事学校除外）系统由凯丰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由任弼时和高岗负责；中央军委系统由王稼祥和陈云负责。中央要求各系统要组织专门委员会，以负责领导延安干部的学习、讨论和检查工作，委员会成员由各系统负责人提出交书记处批准。这次会议还决定由陈云和李富春等九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研究各工作部门的组织机构、工作人员与生活制度等问题，并提出改进方案。为了把整风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毛泽东不久又提出，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和陈云五人组成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负总责，康生副之。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并在6月2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决定：“以后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合并举行，有关整风学习的决定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名义公布。”从这时开始，李富春直接参与了延安整风学习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这年夏天，中央高级学习组进行了调整，按工作关系重新编成9个学习组，李富春参加第三小组学习，成员还有任弼时、王若飞、杨尚昆、王首道和师哲。学习组各小组讨论会每隔一周的星期一上午在杨家岭同时召开。学习组的任务是联系本部门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大家从过去讨论一些具体问题转入到集中检讨党内存在着的根本思想倾向，即毛泽东所说的“主要是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问题”。按照中央的部署，各地也先后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联系本地区的实际进行学习和检查。

转眼间，到了1943年的元旦。由于边区的经济情况已经开始好转，边区的军民过了一个热闹的新年。元旦刚刚过去，又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1月11日，中国和英国政府在重庆，中国和美国政府在华盛顿分别签订了关于废除英国和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问题的条约与换文，英国和美国政府同时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中共中央得知这个喜讯后，立即委托王稼祥起草一个决定，并发出党内指示，说明农历年前后将在各地举行庆祝活动。延安的庆祝活动，中央委托李富春负责组织筹备。经过将近一周紧张的筹备，延安各界庆祝中英、中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大会终于在2月4日，也就是农历除夕的那天隆重召开。第二天是农历大年初一，这无疑为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增添了一份喜庆。

这时，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和检查，中央高级学习组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毛泽东召集李富春等商议后，于3月20日以中央总学委名义发出了《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其中规定：中央各部

委和军委直属各机关的学习文件与工作检查到4月底可以结束,审查干部可转入学习结束后的下一阶段,作为1943年的中心工作之一。

整风进入新阶段前,中共中央对领导机构作了一次重大的调整,其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党的统一领导。3月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整风学习总结计划的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此外,在政治局及书记处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分别由毛泽东和刚刚从华中回到延安不久的刘少奇负责。

4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对整风运动作出新的部署。决定规定,整风新阶段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前一项任务,李富春认为主要是“改造作风”,也就是肃清自由主义作风、建立集体主义的革命作风。为什么要把反对自由主义作风放在第一位呢?李富春指出自由主义危害大,使人“停滞、保守、消沉、堕落”,“放弃自己的革命作用,抹煞是非善恶,抹煞斗争”。他提出应该来一个“作风革命”,把自由主义肃清,把列宁主义作风建立起来。“列宁主义作风”,李富春认为就是“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的结合”。他具体阐述说,“革命热情就是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有对革命事业无限的积极性与责任心,生动活泼,唤醒思想,发扬创造,推动前进,破坏旧物,开展前途。这是对自由主义的无革命热忱、无革命责任心、思想停滞、政治落后、暮气沉沉、维持现状、腐化守旧的消极思想完全相反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既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的革命精神。”“求实精神就是对一切事务,对一切工作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周密考虑、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坚韧贯彻,想到底、干到底。这正是毛主席所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这与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或遇事敷衍、应付了事的官僚主义、事务主义、主观冲动的空谈主义、盲动主义是完全相反的。”

李富春特别强调,改造作风的过程中,要学习毛泽东的作风。他说:“毛主席是精通唯物历史论及辩证唯物论的马列主义者,是全党的第一人。”对什么是毛泽东的作风,李富春作出自己的概括和总结:

一、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心,无限信任,百折不挠,坚韧不拔,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坚决反对党外的敌人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

二、对党的任何工作有无限的责任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深思熟虑,贯彻到底,总结经验,推动前进,创造将来。

三、对群众的密切联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甘当小学生,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

四、是自我批评和遵守纪律的模范,不掩蔽自己的缺点,不容忍同志的原则错误,服从党的纪律,服从中央,服从大多数,遵守决议、制度与法令。

李富春说:“这仅仅是介绍毛主席在作风方面的重要点,我们要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要成为一个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就要向毛主席学习,成为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

七大代表在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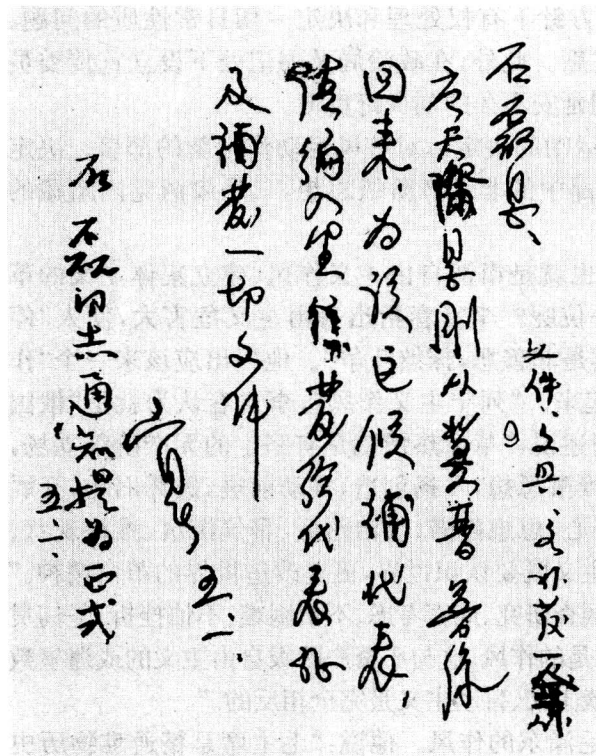
后一项任务被称为“肃奸运动”，也就是中央总学委《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中提到的审查干部的工作。这项工作用毛泽东的话说：“是组织上的清党”，而“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中央决定由中央总学委负责领导审干工作，日常事务由康生主持。为了加强对审干工作的领导，中央还成立了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李富春参与领导中直机关审查干部的工作。

为什么要开展“肃奸运动”？李富春认为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特务政策

而开展的”。他说：它们以“这样的特务政策，特别是两面派的手法来破坏共产党，破坏进步力量，破坏中国革命运动，镇压中国人民。”“我们则要清洗内奸，清洗坏分子。”“这不仅仅是巩固党的问题，而且是要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国民党的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政策的罪恶，以争取群众的问题。”“肃奸运动”的具体任务，李富春认为有两个：一是把国民党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特务分子清理出来；二是清理出来后，诚心诚意地说服他们、教育他们、争取他们。他说：“假如仅仅做到发现坏分子，肃清坏分子，而不争取他走向革命，那我们的任务就只抓到一半，我们的工作也只做了一半，这是不够的。”为什么能够争取他们呢？李富春指出：“其一，青年人一般总是想向前进，想追求真理的；其二，革命的真理在中国共产党方面，一个青年他要求革命，要求前进，就要面向真理，这个真理乃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这个真理恰恰是在我们这方面的。也只有我们才能代表与掌握这个真理。因此，我们去争取他们，感化他们，使他们真正走上革命是可能的。”根据这样的任务，李富春说：

“就决定了我们党在这样一个运动中间的政策是宽大政策。”“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每一个坏分子采取任何急躁、蛮强、粗暴的态度或者采取逼供的甚至打骂的办法都是不对的。”

中直系统审查干部的工作是从4月下旬开始的，动员大会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热情很高，积极性很高”。但是，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主要是“急性病就发生了，从急性病走到急攻”。在三个星期内，挖出了所谓“坏分子”20人，对其中一半人“采取了威吓逼供，甚至打骂的简单的办法”。李富春一直密切关注着运动的发展，很快发现问题，并予以纠正。5月13日，他在中央直属学委召开的所属各单位学委负责人工作总结会议上尖锐地指出：“整风已经一年以后的今天，在这种热情下，主观主义又出来了。这就是革命的热情没有与科学的精神配合起来。”他说：“在过去的三个星期的运动中，曾经发生过这样的行动，这些同志的确是我们党的积极分子，他们很想



七大副秘书长李富春为七大代表唐天际与会事宜写给石磊的一封信（1945年5月1日）。

把特务分子发现出来,这种精神很好,但方法是错误了。这样的粗暴的态度,急躁的心情,打骂的行动,都不是符合我们党的宽大政策的。事实与经验告诉我们,凡是采用这种粗暴态度、强迫方法的,没有一个把问题解决好的。”

当然,对宽大政策也要有正确的理解,李富春是这样解释的:“宽大政策不是自由主义,不是麻木不仁,而是发现坏分子、教育坏分子、改造坏分子。”他还说:宽大并不是不要镇压,但“今天宽大政策与镇压政策不是平行的两方面,不要把宽大政策与镇压政策看作是相等的,更不要把镇压看作是主要方面,现在主要的是宽大的一面,不是镇压的一面。宽大为主,镇压为辅。镇压的是少数甘心作特务顽固不化的人。”

对中直机关有些部门列出的“坏分子名单”,李富春认为“是不慎重的,提出的人照材料看来,实在是思想意识上的落后,还不能称为是什么政治问题”。他指出:“对中直机关的坏分子应该有一个足够的估计,应该有足够的警惕性。但要有仔细分析的能力,搜集充分的材料,仔细去研究,仔细去分析,不要捕风捉影,不看对象。”他要求各机关对已经挖出的所谓“坏分子”应重新审查和确定。

为了纠正错误,进一步做好审查干部的工作,李富春对与会者提出了三条要求:一、要真正的深刻的了解与掌握政策,不要盲目的上“前线”,不要随着运动跑,随着客观潮流跑。他说:“我们领导者不要跑到前面去脱离群众,但我们也不作群众的尾巴,我们要真正掌舵。”二、要反对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自己要掌握材料,研究问题,指导行动,要抓得很紧,一点儿自流现象也不能发生。他说:“领导者要从开始到结束一直要注意,要亲自负责。这有双重任务,好像演戏一样,一方面要担任导演告诉教导人家如何演戏,一方面自己又要当主角出演。”三、要有计划、有准备、有阵地的前进。他说:“没有阵地的前进是得不到任何结果的”,“没有充分的准备,搜集材料、判断问题、分析问题,想得到胜利是不可能的。就如军队作战一样,事先没有很好的侦察工作,没有对敌方的了解,想打胜仗是不可能的。”他希望今后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要更勇敢、更积极、更慎重的有阵地的前进,“把革命的热情与干革命事业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可以看出,李富春从审干工作一开始,就在努力引导运动向正确的轨道发展。然而,和李富春一起负责中直系统审干工作的康生却采取了另一套主张和办法,他夸大敌情,采取错误的做法,使运动出现偏差。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机关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后,各地相当普遍地大搞“逼供信”,搞得“特务如麻”,使审干工作在一个时期中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情况很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要求立即纠正这种错误做法。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决定中正式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审干工作九条方针。这九条方针对纠正审干工作中的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这年年底,延安审查干部的工作转入甄别阶段。甄别,也就是要求实事求是地纠正审干运动中出现的偏差。李富春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他以严肃负责的态度指出:

“甄别工作是防奸运动的重要阶段,没有这个阶段,防奸运动是不完整的。党中央的防奸路线方针是否正确,是否得到成绩,是否胜利了,只有经过甄别工作,才能深刻体验的。离开甄别工作,抓着防奸运动中的一个事实,一个片面来判断党的路线是否正确是否得到胜利,这是不可能的。”李富春认为“甄别工作是大家更实际的整风。如果四二年的整风还是在总结过去,研究文件,自我反省,我们还存在着三风不正的残余,因此在防奸运动中间发生了

七大代表在七大

错误与缺点，而甄别工作就是要我们实事求是的克服这些错误缺点。如果四二年以前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而四三年以后又发生了特务如麻的思想，那么甄别工作，既是反对自由主义、麻木不仁，也要反对草木皆兵、特务如麻。而是要我们贯彻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是则是、非则非的思想。我们要好好的反省，我们要在甄别工作中不再走到麻木不仁、否定一切，也不再犯特务如麻、肯定一切。”

1944年9月，中直系统学委会在杨家岭用了一周的时间总结前一阶段的问题和部署新阶段的工作。会议的精神是：“打通思想，了解政策，提高自觉性，推动加紧甄别工作。”李富春在会上作了关于甄别工作问题的报告。他首先对前一阶段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主动承担责任，说：“倘若过去防奸中间有了错误，这首先由中直学委来负责的，而在中直学委内，首先又是我负责的。”他十分重视防奸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坦率地指出：

“要认识到它的严重性是不小的。因为搞错了人，冤枉了人。我们不要因为这是胜利中的错误而原谅自己，我们要有勇气，实行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正视错误，改正错误。这不是降低威信的问题，更不是谁负责的问题。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拥护客观真理的，我们具备毛主席所讲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则是，非则非，路线对的就是对的，搞错了就是错误了。这种自我批评的勇气，是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才有的，这样才能使我们不断的前进。如果怕自己的威信降低，不敢实行勇敢的自我批评，就不能很好的接受经验教训，对于自己的进步是有阻碍的。”

对如何搞好甄别工作，李富春提出十条意见：

一、要掌握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断的提高甄别工作的能力。要耐心的提高甄别者的自觉性，使其懂得，只有双方实事求是，双方负责，才能解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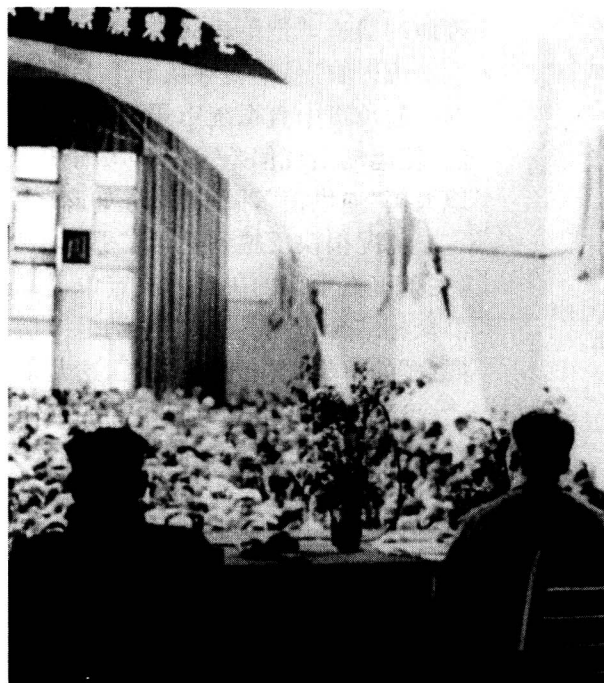
二、要具体的分别各种被甄别者的思想和心情，对完全搞错了的，要让他发牢骚，应该接受他的批评和引导他进行适当的自我批评。对因半条心搞错的，对他也要进行自我批评和批评，指出他的错误，将他们的思想搞通，把坏意识的根子挖掉。对于真正有问题的，要孤立他，将他的影响减少，使大家认识他的为人，同时要好好的同他谈话，从思想上开导他提高自觉性。在甄别中间，不仅要注意特务问题与非特务问题的区别、政治问题与非政治问题的区别，而在政治问题中间，也要细致的分别他的是非轻重。

三、要抓紧时机，实事求是的开展甄别工作，真正集中精力，集中思想，真正的负责的态度，不是追求数目字。要反对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的态度。

四、要善于配备力量，有计划的将被甄别的进行分工，成立甄别小组，各小组要建立汇报制度，讨论是非，研究经验，总结经验。

五、各单位要不断的召开宣布甄别结论的会议，不是的摘掉帽子，将甄别运动推向前进。

六、要着重调查研究。



七、要并案研究。

八、要抓住关键问题，不要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研究，把他三十几岁的历史都研究的清清楚楚，这是费力不讨好。

九、要进行个别谈话，请本人自己实事求是的作结论，作得好的我们用它，作得不好的，我们参考。

十、结论尽可能作完全，不要留尾巴。要明确，不要模棱两可。要有根据，人情入理，不要失掉立场。对于不是政治问题的，结论不要太苛，因为我们还希望他进步。

李富春的这些意见，对中央直属机关按照中央的精神作好甄别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审干工作开始后不久，中共中央得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通报：将于5月22日解散共产国际。5月2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来电，会议决定复电表示赞成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待共产国际公开宣布主席团的这一提议后，中共中央再作正式决定。

会议结束后，李富春受中共中央委托到王明处将电报给他看，问他有什么意见。王明说：“近年来情况不了解，这是一件大事，估计有两个作用，一是免得各国党被人挑拨是与外国政党有关系；二是恐怕进一步有大变化，即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将与社会民主党采取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殖民地的党更将与资产阶级的党进一步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谈到这里，王明突然问李富春：林彪去年曾大胆的主张国共两党合并是否他个人的意见。李富春回答：是他个人的意见。王明说：“国民党除了十年内战外，是民族联盟的性质，带着民主革命的方向，更有民粹派的特点。”他还说，过去在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等人交谈时，伏罗希洛夫曾问他：“苏联只打五年内战即胜利，中国共产党打了十年还未打出名堂何故？”王明回答说：“因为苏联内战时革命的方面占有中心城市



七大会场内景。李富春、彭真、陈毅、张闻天、彭德怀(右起)等在七大主席台右侧入座。

七大代表在七大

及工业故能取胜。”斯大林当即表示：“这是对的。”王明继续对李富春说：“农民的游击战争不能最后的解决问题，国际常告诉我们要注意城市工作、工人运动与军事工业。即此，现恐怕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还要进一步。这是我的胡说八道，中央应去电赞成，并可问问以后联络办法。这种变动不是政治方针的变动，而只是组织形式的变动。”事后，李富春立即用书面的形式向毛泽东报告了与王明谈话的情况。

5月26日，中共中央收到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李富春出席这次会议。当天晚上，中央书记处召开有千余干部参加的大会。大会由任弼时主持，李富春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共产国际的解散，很重要的是可以使各国共产党更好地按照本民族的实际去发展。国民党顽固派却以此为借口，制造舆论，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同时调重兵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严重挑衅，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军事、宣传等方面作了充分的应对准备，很快打退了这股反共浪潮。经过这场斗争，党内更多的人进一步认清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同时对王明在抗战初期所鼓吹和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看得更

清楚了。系统清算王明错误的时机已经成熟。整风运动按照原定计划进入总结历史经验的阶段，这也是整风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

从这年九月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这次会议也被称为“九月会议”。同1941年九月会议相比，这次会议开的时间长，参加的人数也多，除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等11位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外，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等19人也列席会议。会议原准备开五次，隔一天开一次，后来改变计划，把整风检查与党史学习穿插进行，断断续续开到年底。会议主要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由于王明没有到会，开会的方式，除了与会同志作一般性发言外，主要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并批评王明的错误；其他同志发言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提高认识。11月29日，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同王明谈话，转告会议的情况，并告诉他：即将召开党的七大，中央正组织七大代表和各级干部700人学习党的历史。



李富春与夫人蔡畅在延安合影。

同时，中央政治局也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教条主义宗派的错误，包括他王明的错误，希望他认真作出检讨。12月1日，由王明的夫人孟庆树代笔，王明本人签名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因病不能参加学习，很觉难过”，“中央所讨论的关于我的错误和缺点问题，虽然我现在没有精力详加检讨和说明，但我认为有向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原则上的明确承认之必要”。他在信中承认，1941年9月底10月初时同毛泽东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问题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他表示：“我很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提出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使我有可能会和我的这些错误和缺点作斗争。”他还说：“在毛主席和各位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明的言行是不一致的。

经过九月会议的学习和对错误路线的深入批判，党内对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这期间王稼祥和刘少奇先后提出的“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重要论断也达成共识。在这种团结统一的气氛下，中共中央认为，尽快召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七大的召开作准备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从1944年5月21日开始，原来准备开两个月，后来因为时局的发展变化，断断续续开了11个月，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这是党的历史上开得最长的一次会议。

5月21日，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7人，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康生、彭德怀、洛甫（张闻天）、邓发、陈云、博古、罗迈、李富春、吴玉章、杨尚昆、孔原、陈郁。还有各方面负责同志12人。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在全会期间，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由七中全会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

七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为准备七大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起草“历史决议”。这也是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的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事前，中共中央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任弼时作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负责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毛泽东对“历史决议”稿进行七次修改，并在第一次修改时将题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李富春等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多次参与“决议”稿的讨论并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

在“决议”稿第四稿写出后，李富春曾给任弼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第四稿写得很完备，毛主席的思想写得更多，正反对照更明显，有些问题提得更好（如提毛主席的思想体系，强调四中全会的宗派主义等等）。”同时，他还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关于对三中全会的估计，李富春认为：“停止立三路线，及结束了立三路线的特征的错误，估计是对的，这是三中全会好的方面。”“四中全会的前后，放弃主义反立三路线，决未超过此范围。但是，三中全会之所以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立场的原因是由于仍旧站在立三的‘左’倾错误的立场所及，因此不能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实质。”“如果三中全会后，全党同志赞助三中全会结束立三路线的措施，同时又能帮助与督促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纠正三中全会之不足来进一步思考反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使全体更好的团结起来，这也是好的。”

关于结论，李富春认为，决议稿中对“左”倾的李立三和右倾的林育南都作了结论，但对瞿秋白却没有作结论，似应补充几句才好。